

国内关于辽朝中京大定府研究综述

王 帅 姜维东¹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长春 130032

摘 要: 辽朝五京共同构成了五京体制,其中上京是辽朝最早的首都。中京修建后,辽朝的政治中心逐渐南移,中京也成为了辽朝国家礼仪的中心。于是有些学者认为,辽朝中后期实际上的首都,已经由上京迁往了中京。但是,因为辽朝具有城国与行国的双重性质,所以对于辽朝中京的研究存在较大争议。学术界最早关注辽朝中京大定府的是清人顾祖禹,他认为辽朝中京设置后,辽朝国都迁往中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谭其骧在此基础上提出辽朝迁都中京说,中京问题逐渐走进学者视野。学者们对辽朝中京的性质与作用、中京与四时捺钵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比较广泛的讨论。经过四十年多年发展,中京问题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因此有必要对中京问题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这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 中京; 辽朝; 辽圣宗

辽朝中京大定府设置于统和二十五年。中京建成后,辽朝的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到中京,中京成为辽朝后期最重要的都城,对辽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辽朝迁都中京说提出后,围绕大定府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根据大数据统计,关于中京大定府性质的论著篇32(部),关于大定府作用的论著篇64(部)。本文将从辽朝中京性质、辽朝中京作用对辽朝中京的有关研究作一综述。

一、辽朝中京大定府的性质

关于中京性质的研究,学界争议较大,尚未达成普遍的共识。主流观点有中京为辽朝后期都城说、中京为礼仪或象征都城说、中京为陪都说、辽朝无都城说四种学说。

中京为辽朝后期都城说,是清人顾祖禹首次提出,“辽西曰中京,宋景德四年,隆绪城辽西为中京,府曰大定,自上京徙都焉”^[1]。同时代王之枢也有相同论述“城辽西,为中京。辽西幅员千里,多大山深谷,险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饶乐都督府,至是主建都于此。”^[2]但

是顾、王二人对辽朝迁都中京问题,没有展开具体细致的论述。20世纪40年代,钱穆也认为辽朝迁都中京^[3],但是也没有进行具体的解释和论证。70年代,谭其骧在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认为,辽朝后期都城应在中京,不在上京。谭其骧认为中京城内的驿站设置、宗庙设置以及囚禁宗室等情况,认为中京是辽朝国家政府的常驻地,虽然辽朝没有宣布正式迁都,但是辽朝事实上的都城已经由上京迁往中京。^[4]曹显征不仅支持此观点,而且通过对中京地区地理环境、人类活动遗存、历史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分析,探讨辽朝迁都中京的原因。^[5]李冬楠对谭其骧十条论据进行了史料补充,肯定中京的都城地位。^[6]任冠论述了大明城遗址的规模,认为大明镇城址的规模远超于一般的辽朝州县,就其地理位置、交通道路以及城址型制结构等因素,足可以证明中京就是辽朝后期的都城。^[7]李宇峰将《王说墓志》《冯从顺墓志》《皇弟秦越国妃萧氏墓志》与《辽史》内容结合讨论,认为中京是辽朝晚期事实上的首都,但是辽朝并未迁都,辽朝实行的是两京制。^[8]

中京为礼仪或象征都城说。李锡厚论述了五京和捺钵的关系,认为辽朝政治中心在捺钵,五京应该从属于捺钵,中京只是处理一般朝廷事务的场所。^[9]认为辽朝政治中心在捺钵,因此中京只是辽朝中后期名义上的都城且只是礼仪上的都城;中京只是统治汉族地区的最高机构,政治上隶属于捺钵;辽朝皇帝也并不经常居住在中京,只有在接待宋使时会临时暂住中京,也不居住在

作者简介:

王帅(1997.10—)男,汉族,天津人,长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辽史;

姜维东(1971.03—)男,汉族,吉林农安人,长春师范大学东北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史,东北史研究。

宫殿内，而是居住在宫殿外的车帐里。^[10]陈晓伟将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首都分成了三大类：有名无实的政治象征型、都城与季节性营地复合型、都城政治功能日益强化型，辽朝五京属于有名无实的政治象征型都城。^[11]张宪功论述了传统文献对于中国古代“都”的定义，认为辽朝五京都具备都城性质，但是因为辽朝政治中心在捺钵，所以辽朝五京只能是“形式之都”。^[12]

中京为陪都说。项春松认为中京只是辽朝极盛时期的陪都。^[13]林荣贵则反对辽朝后迁都中京说，林文以首都的建立或者迁徙，要有改王朝在法律上明确肯定才行，因此上京始终是辽朝法律上存在的首都，中京只能是陪都。^[14]但是林氏此文以帝制国家王朝法律为立足点，论证缺乏有利的证据，且猜测推论过多，所以没有引起较大的影响。李逸友认为承天太后和辽圣宗只有在每年的岁末和新正期间才到中京居住，接待完宋使以后，便返回捺钵地，而且考古挖掘也没有发现大面积官署遗址，所以辽朝迁都中京的说法也就不成立。^[15]李逸友、李宁将谭其骧列举的十条证据分成了四类进行辩驳，认为中京是否为辽朝后期首都，关键是如何考虑四时捺钵制度，同时必须将契丹的民族特性考虑进去。^[16]朱士光认为辽后期辽帝留居中京处理政务是与北宋斗争形式发展的需要，中京只在必要时发挥都城的某些都城功能。^[17]

辽朝无都城说。20世纪40年代，傅乐焕^[18]、姚从吾^[19]等学者就已经提出辽朝的国家政治中心不在五京，而在捺钵之中。五京的设立只是为了管理汉人和汉化程度较深的渤海人，辽朝五京都没有发挥政治中心的作用。杨若微对谭其骧的十条论据进行了驳斥，认为辽朝的统治中心不在捺钵，也不在五京，而是在斡鲁朵中，所以辽朝五京没有任何一京发挥着首都的作用，自然也就没有迁都之说。^[20]李桂芝则认为辽朝政治中心不在五京，而在具有行国特征的“捺钵”之中。^[21]肖爱民对辽朝五京、四时捺钵、斡鲁朵、行宫部落进行了分析，认为辽朝的政治中心不在上述之地，而在“行朝”即“以皇帝牙帐为中心，包括后宫、前朝衙门、太庙和卫士等在内的游牧聚落”。^[22]

二、辽朝中京大定府的作用

控制奚族说。李涵、沈学明对奚族在辽朝的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论述，认为与上京相比中京更适合农业发展，因此辽圣宗要设立中京，加强对奚族的控制，也间接增加农业税收。^[23]杨若微论述了奚族在辽朝地位的变化，

认为辽太宗征服奚族后，奚族仍保持相对独立性，辽圣宗通过改革将奚六部的管理权收归北府，奚王府名存实亡，辽朝也随之设立中京，开始对奚族实行直接统治。^[24]康鹏则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虽然奚六部管理权收归北府，但是奚王依然有统辖奚六部的权力，辽朝仍旧任命奚监军对奚族进行监视，中京设立后，不断的将渤海人、汉人迁徙到中京地区，形成奚族部族与渤、汉州县交织在一起的状态，以此加强对奚族的控制。^[25]郑毅论述了契丹与奚族关系的变化，认为辽朝上京、南京、东京相距太远，缺少衔接，三者中间又是奚族之地，于是辽朝设立中京加强三都之间的联系，也进一步控制奚族。^[26]吴凤霞研究了澶渊之盟后辽朝内外局势的变化，认为合约之后辽圣宗的首项举措就是在奚族旧地设立中京，彻底的将奚族控制在辽朝征服的管控之下。^[27]

与宋交往说。李逸友认为中京地近中原便于契丹与宋朝的交往，因此设都于中京。^[28]陈述认为辽帝冬、夏捺钵时接待使者，但过于简朴；而宋朝却是中原文化传统的朝廷，礼节周备；自谓天下正统的辽朝，自然不愿意以简朴示人，因此接待宋使是营建中目的之一。^[29]张艳秋、青白音认为澶渊之盟后宋辽重新开始往来，上京过于偏远，因此营建新都便于宋辽之间文化上的交往，也有利于军事、外交上的需求。^[30]

其他研究。苏赫论述了中京城的建筑群，认为中京的修建使契丹族接触到城市生活，从而加速向定居过渡，也增加了和中原的文化交流。^[31]孟广耀认为中京是一个象征北方各民族团结的友好古城。^[32]杨树森通过论述中京的地理位置、城建布局，认为中京促进了辽朝商业繁荣，加强了各族之间的商业往来。^[33]曹显征对辽朝迁都的原因展开论述，认为中京是辽朝汉化程度最深的都城，标志着辽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南移。^[34]王德忠论述了中京的军事、经济以及文化作用。^[35]

参考文献

- [1] (清)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中华书局, 2005.03.
- [2] 刘体智. 清代纪事年表, 原名, 历代纪事年表. 影印本[M]. 文海出版社, 1968.
- [3] 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4] 谭其骧. 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J]. 中华文史论丛, 1980, 02: 43-53.
- [5] 曹显征. 辽中期徙都中京原因管窥[J]. 昭乌达蒙族

- 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2): 25-31.
- [6] 李冬楠. 辽代都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 齐鲁学刊, 2009(03): 50-53.
- [7] 任冠. 辽中京道城址的考古学观察[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6(02): 66-76.
- [8] 李宇峰. 辽《王说墓志铭》考释——兼论辽中京为中晚期首都[J]. 辽宁省博物馆馆刊, 2016(00): 26-31.
- [9] 李锡厚. 论辽朝的政治体制[J]. 历史研究, 1988, (3): 119-135.
- [10] 李锡厚. 辽中期以后的捺钵及其与翰鲁朵、中京的关系[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1, 000(000): 95-100.
- [11] 陈晓伟. 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J]. 历史研究, 2016, (6): 16-33, 189.
- [12] 张宪功. “形式”之都与“移动”之都: 辽代都城解读的一种尝试[C]//中国古都研究(第三十三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7: 14-24.
- [13] 项春松. 辽中京遗址[J]. 文物, 1980, (5): 89-91, 107.
- [14] 林荣贵. 辽后期迁都中京说驳议——与谭其骧教授商榷[J]. 中华文史论丛, 1983, (1): 291-310.
- [15] 李逸友. 内蒙古历史名城[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08.
- [16] 李逸友, 李宁. 辽中京为后期首都说的商榷[C]//中国古都学会. 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八辑上册)——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国际华文出版社, 2001: 190-200.
- [17] 朱士光. 辽五京研究的几点新见[C]//中国古都学会. 中国古都研究(第三十三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7: 8-13.
- [18] 傅乐焕. 辽史丛考[M]. 中华书局, 1984.
- [19] 姚从吾先生遗著整理委员会. 姚从吾先生全集(五): 辽金元史论文(上)[M]. 正中书局, 1980.
- [20] 杨若薇. 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修订版)[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 [21] 李桂芝. 辽金简史[M].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 [22] 肖爱民. 辽朝政治中心研究[M]. 人民出版社, 2014.
- [23] 李涵, 沈学明. 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J]. 宋辽金史论丛, 1985, :
- [24] 杨若薇. 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修订版)[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p161~162
- [25] 康鹏. 辽代五京体制研究[D]. 北京大学, 2007.
- [26] 郑毅. 辽与奚族的关系演变及辽中京的建置开发[J]. 学理论, 2012, (35): 204-205.
- [27] 吴凤霞. 辽圣宗与辽中京[C]//中国古都学会. 中国古都研究(第三十三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7: 25-34.
- [28] 李逸友. 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J]. 文物, 1961, (9): 34-40.
- [29] 陈述. 契丹社会经济史稿[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03.
- [30] 张艳秋, 青白音. 奚王牙帐、辽中京、元北京[C]//中国古都学会. 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八辑上册)——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国际华文出版社, 2001: 249-259.
- [31] 孙进己. 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辽2[M]. 北京出版社, 1997.
- [32] 孟光耀. 辽中京——象征民族友好的古城[J]. 实践, 1983
- [33] 杨树森. 辽史简编[M].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 [34] 曹显征. 辽中期徙都中京原因管窥[J]. 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2): 25-31.
- [35] 王德忠. 论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J]. 北方文物, 2002(01): 77-81